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自我认知

哲学自传的体验

尼·亚·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利 译



571.2
B972
B872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自我认知

——哲学自传的体验

尼·亚·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制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育曙 朱 原
封面设计：李惠明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

别尔加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53 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22-02281-3 / I·611 定价：16.50元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总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中都有天才的创造。稍后，它又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大放异彩。俄国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国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和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人们称其为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就整体的影响而言，白银时代的文化似乎还超过了黄金时代，如果说普希金他们这一代人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俄国，为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嫁接做出了成功的试验，那么，白银时代的一代人则在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的同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让俄罗斯理念以迥异于传统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模式走向了世界。

5/168/01

二十年代中期，白银时代文化在俄罗斯本土消隐。不过，其影响、其代表人物的活动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着。如今，在世纪之末，俄国白银时代涉及的许多思想命题，不仅继续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而且愈来愈多地引起了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它都可能是本世纪最大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相近的国情、相近的文化积淀和相近的民族心理结构，俄国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思想历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有着极大的参照价值和启迪意义。但是，我国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介绍和研究，迄今仍基本是一个空白。鉴此，我们决定率先编译这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俾使国内的读书界、学术界得以目睹这一灿烂的文化景观。

本丛书以文学为主，兼及其它人文学科；既有重要作者的别集，也有重要思潮或流派的合集；既有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也有意蕴深刻的思想性著作。它们相互之间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全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很多作品完成于十月革命以前，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个别作者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误解，以致于在个别行文中出现了某些偏颇之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编译过程中进行了局部性的删节和技术性的处理，但恐怕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恳切地提醒读者诸君在阅读时加以细致的甄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分析和批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获取真正有益的养分。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人的精神拯救

——自由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简论

汪剑钊

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尼·亚·别尔嘉耶夫是最具个性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毕生关注人类精神史的发展，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著述活动中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他葆存着俄罗斯灵魂特有的爱和悲悯，以人格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尘世间的恶、苦难与不幸，针对人和宇宙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上帝与恶魔、信仰与知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永恒与时间、存在与虚无、自由与奴役、真理与伪理、文化与文明、自我与非我、毁灭与复活，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建构了他本人所命名的末世论哲学。他那富含宗教意味的思想对二十世纪风靡全球的存在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欧洲思想之路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一、小传：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

1874年，别尔嘉耶夫出生于基辅。他的父亲属于军功出身的上流贵族。曾祖父和祖父曾是沙皇麾下骁勇善战的将军。父亲也是一名退役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在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烙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母亲是一名伯爵的女儿，身上有一半法国的血

统，从小接受的是法国教育，她在进行交谈和书写的时候，法语水平远远高出俄语的水平。她在信仰上尽管属于东正教，其内心情感却更认同天主教。别尔嘉耶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东正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相遇和冲突的环境里。此外，如同俄罗斯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一样，奶妈对未来的哲学家在道德构成上起着特殊的影响，善良、仁慈的她激发了别尔嘉耶夫对普通人的热爱与同情，帮助他加入了“忏悔的贵族”的行列，铸就了他与人民紧密的联系。

按照贵族的惯例，别尔嘉耶夫在十岁上进入基辅武备学校，以便将来成为沙皇的侍从官。但是，出乎家人意料的是，这个军人的后裔在天性上极端厌恶战争和军人，对武备学校学生身上的粗鄙和野蛮深恶痛绝，念到六年级时，他便自动退学了。1894年，别尔嘉耶夫以校外考生的身份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律学系。早在少年时代，别尔嘉耶夫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认定自己负有哲学的使命，并且啃读过如《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那样艰深的著作。大学期间，他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著作，进行哲学思考。同时他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终生怀有好感，即便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后，他依然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理想）。1898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除名。同年，他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在报刊上。1901年，他被判流放于沃洛格达省，他在那里成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讨俄罗斯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之一——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以后，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创办《生活问题》杂志。他在那里结识了梅列日柯夫斯基和吉皮乌斯。通过这一对夫妇的介绍，别尔嘉耶夫接触到了聚集在彼得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和争论

俄罗斯的出路问题，寻觅生活的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意义的探索已经给出了生活的意义”。因此，他已决意在俄罗斯的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做一名滚动巨石的西绪弗斯。

1909年，别尔嘉耶夫与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人合作出版了一本文集《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对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从各个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局限，呼吁人们抛弃激进的乌托邦幻想，致力于精神的新生，在民主社会里重建贵族的理想主义，以消除个性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这部文集在当时反响极大，被认为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在欧洲整个社会向善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论点不曾被这些作家所采用或被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见”。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自由哲学》一书。这部著作是他前期哲学探索的一个方向。他有时被人称为“自由哲学家”，其源起就在于他坚持“世界的奥秘就隐藏于自由”，终生都在写作自由的哲学，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它。在随后完成的《创造的意义》中，别尔嘉耶夫猛烈地抨击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和神正论，阐述了创造的意义，尝试着以个性的体验为依凭去建构人格主义的哲学。在这两部著作中，别尔嘉耶夫精神探索的两大主题已经基本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18年，论文集《俄罗斯的命运》出版，在知识圈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别尔嘉耶夫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从此，他就在流亡的状态下度过了一生。别尔嘉耶夫起初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办了宗教哲学学院，结识了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舍勒，在相互的交往中各自丰富了自

己的思想。1924年，他出版了《新的中世纪》。该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帮助他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同年，他迁居到巴黎市郊的克拉玛尔。他在这里进入了自己创作的巅峰状态，撰写了一系列自认为最有意义的著作：《自由精神的哲学》（1927，1928）、《论人的使命》（1931）、《精神与现实》（1937）、《论人的奴役与自由》（1939）、《俄罗斯理念》（1946）、《精神王国和凯撒王国》（1949），以及一部独特的精神自传《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等等。除著述以外，他还与当时宗教哲学界的主要人物，包括雅·马利坦、埃·日尔松、埃·穆尼埃、加·马塞尔、卡·巴特等有密切的往来，他的寓所是当时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别尔嘉耶夫神学名誉博士学位。此前，在俄罗斯人中间，只有屠格涅夫和柴柯夫斯基获得过此项殊荣。同年，他又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通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走完了整整七十四年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

二、俄罗斯灵魂的界定

本世纪初，别尔嘉耶夫主要沿着索洛维约夫走过的“俄罗斯理念”之路，试图为俄罗斯的灵魂给出一个切实的定义，他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详尽深入地分析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指出在这些特征背后潜在的生机和危机。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俄罗斯是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这个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它同时容纳了西方和东方两种因素，在精神深处有两股势力发生着冲撞和相互作用。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上生长起来的文化，明显具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性”特

点。一方面，俄罗斯是最无组织、最无秩序的国家。无政府主义在这块土地上拥有天然的温床，人们几乎像害怕瘟疫似地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与此相联系，俄罗斯人企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带有较强的阴性特征，被动、驯顺、温和。这铸就了俄罗斯民族的无政府主义又是一种缺乏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自由“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而是让人还给自己自由，一种远离积极性的自由”。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够把任何事物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俄罗斯人为捍卫它们的存在和维持它们的运转耗尽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沉重的负荷下失去了个体权利的自觉，不再重视个性的生存。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高尚与卑鄙混合在一起，天使的成分与魔鬼的成分混合在一起。

显然，一般的理性无法彻底理解俄罗斯。在俄罗斯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元素，它敌视理性，敌视整个文化、整个意识、整个精神性。受着酒神狂欢的驱使，俄罗斯人善于把历史转化为幻想，把现实生活变成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浪漫小说。别尔嘉耶夫将它称之为“黑葡萄酒”元素。在俄罗斯的文化积淀中，它是一种黑色的、阴郁的、蒙昧的、不透光的自然力。任何人一旦接触了这种迷狂的东西，就不能不沉醉于其间，很难挣脱它所营造的氛围。这种自然力不仅存在于普通的老百姓中间，甚至在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流露。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便在自己的创作中有着深刻的揭示，并以自己不安的生活印证着它。

与上述非理性因素相联系的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宗教

感。一般而言，追求自由的俄罗斯人并不严格地恪守着某种宗教教义，奉行某种戒律。但是，在他们的天性中并存着两种因素：狄奥尼索斯式的放纵和东正教的禁欲。蛰伏在这种放纵与禁欲背后的是，俄罗斯人“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就自己的类型和灵魂结构而言，是信仰宗教的人民。即使是不信宗教者也仍然有宗教性的忧虑，俄罗斯人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俄罗斯人即使离开了东正教，也仍然会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俄罗斯人大多崇拜精神，倾心于现实以外的存在。别尔嘉耶夫对此的解释是，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包含有强烈的末世论因素，不满于既定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渴望变革，渴望完满的新世界之出现。在俄罗斯的风俗中，复活节是“节日中的节日”，它象征着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之复活，暗喻生命以死而复生的形式，最终战胜死亡。宗教对俄罗斯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们自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是上帝的选民，担负着拯救人类的义务。可以说，救世主义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思想史。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俄罗斯人把莫斯科称之为第三罗马，认为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俄罗斯文学为什么会沉淀着那么多的救世精神了。别尔嘉耶夫的解释是，“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说明，俄罗斯作家能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悲悯感和全人类的高度震撼了世界，并非出于偶然。

三、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反省

在俄罗斯命运的转捩点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其使命，是别尔嘉耶夫一直关注的命题。《路标》文集的开卷之作就是他的

《哲学的真与知识分子的真理》。在这篇文章中，别尔嘉耶夫指出，知识分子的急躁冒进是造成其尴尬和悲剧的主要原因。这种功利主义的表现源自他们对哲学的隔膜和误解。他们怀疑哲学的独立性，以道德主义、科学主义的判断对它提出要求，“俄罗斯知识分子像对待经济生产一样对待哲学创造”。别尔嘉耶夫感到，在俄罗斯，哲学的命运是痛苦而悲惨的，它时而受到蒙昧主义的迫害，时而受到理性主义的怀疑，一直处在被放逐的位置上，进入不到民族生活的深处，只能在大学和研究院里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寻求避难。哲学意识的匮乏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软弱的状态中。

在俄罗斯的社会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极为重要、极为特殊的作用。他们作为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既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特性，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构成物，标志着俄罗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所达到的高度。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考察，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一部分贵族青年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认识到自己文化的落后性，不满足于现实，起而支持彼得的改革，在教育、出版、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对俄罗斯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君王专制和农奴制的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从他们的鼻祖拉吉舍夫开始，流放和死刑仿佛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作为一名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本人也同样承受着这一份痛苦和光荣。

然而，比起上述外在的流放更富于悲剧性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都体验过内心的流亡，孤独和无根性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面对上层社会的反动腐朽和下层人民的愚昧落后，知识分子承受着双重的压迫。作为前者的叛逆，他们良知的天平

无疑倾向于后者，为争取后者的利益和权利而斗争。可是，当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去反对官僚和帝国的时候，人民并不理解他们，响应他们流血的呐喊的只是沉默。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知识分子成了一种没有根基的存在，亦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多余人。由于这种无根性，知识分子不知不觉滋生了急于获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可的愿望。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接受了虚无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上则往往采取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方式，民粹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堪称典型。结果，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以手段代替目标的做法，利益可以凌驾于真理之上。知识分子在正义、平等、幸福、善、爱的幻象下从事革命，甚至不惜牺牲人性和真理。实际上，“以恶抗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恶”，反而使原有的“恶”有变本加厉的危险，导致俄罗斯知识分子勇敢无私的牺牲变成了无价值的英雄主义。这里，纯正的精神探索被物质世界的诱惑所玷污了。对此，别尔嘉耶夫提出的疗救方式是，进行“自我批评”，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通过“自省与忏悔”去探索新的意义，坚持思想的独立品格，接受哲学的炼狱之火的考验，让真之本能苏醒过来，摆脱内在的奴役，从而完成自己追求终极价值的使命。

四、个性、自由和创造

1.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数千年来，已有无数的哲人智士提出过这个问题，留下了各式各样的解答，但似乎还没有一种答案能圆满地解决它。人是一种充满悖论的生存，他既高贵又卑劣，既仁慈又残忍，既痛苦又快乐，既自由又奴役，既崇尚精神又沉溺物质，既理智又激情，由此铸成了一个幽邃难测的司芬克斯之谜。作为一名生存论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同样无法回避这一难题。他的研究

便从探索人的个性作为起点，“人即个性”。他认为，只有当人以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性进入此岸世界，方能阻止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继续堕落，打破桎梏人的秩序，重新建造一个充满神性、良知的新世界。

按照别尔嘉耶夫的理解，个性不属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它属于伦理学和精神的范畴，与无限性密切相关，并不混同于周遭世界的有限形式。个性是动力的，而非静态的，但又是变化中的恒定、多样性中的统一。个性是有理性的生存，但又不被理性所决定和限制，它充满了非理性的激情，具有戏剧般的张力。个性是主体，甚至是“主体中的主体”，是真正的存在，它只能走向创造，而不应被客体化。至于个性的实现途径，则是抗拒和超越。现实世界充满了邪恶、奴役、欺诈、不公、混乱，唯有坚决抗拒本能的堕落，在苦难的刺痛中激活自身才能凸现个性，向往上帝之国，走向拯救的可能。“超越，是一个蕴含着动力的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体验。具体而言，意味着在自己的生存中体验地狱、深渊、灭顶之灾，顿生阻断之感，引发创造的举动”。人是动物，但又不仅仅是动物。动物只有条件反射，没有思想和超越。人却不同，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满现实，就是他的敞开性。人哪怕处在生命的谷底，也依然会向往超尘脱俗的高远天空。

但是，强调个性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是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者躬行自我隔绝，自我肯定，把个人作为暴力的竞技场，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作豺狼关系。在本质上，个人主义的行为是一种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行为，是向外抛出的行为。个人主义对统治、强力、功名、享乐的企盼和渴望使人沦为客体的奴隶，在奴性地对待“自我”以后，又不得不奴性地对待“非我”。这样，个人主义在扼杀了别人以后，也戕害了自己，因此造成了精神核心的丧失。个性则不然，它植根于自由王国，“具

有亲和的倾向，希望达成人们的兄弟友谊”。具有个性意识的人，其服务意识也极强，他们时时肩负着人类的永恒的使命。他们丰盈、充实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寂寞、孤芳自赏不能同日而语。个性既是精神的生存，又是具体的生存，它在渴慕上帝、渴慕神性、渴慕天堂的同时，并不回避尘世的苦难，而是以一种“俯临之爱”向下介入，去拥抱承受着灵与肉煎熬的人们，帮助他们脱离金钱、情欲、功名、利禄的诱惑与奴役，去成就个性，成为自由人。

2. 自由高于存在

人的个性能否实现，与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统的本体论认定，共相——普遍的事物是真正的存在，殊相——个别的事物是派生的、从属的和虚幻的存在。理想、理念的存在是真实的，至于多样的、个体的世界不过是第二位的、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的。这样，它就把一切个性的、自由的元素强行纳入了一个普遍的、必然的王国之中。客体化的决定论控制了自由的生存。别尔嘉耶夫坚决反对和拒斥这种理论，他认为，正是个性、殊相包含着普遍、共相，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概念的生存，一切必然性、客体化都是幻象，都是虚假的生存。

关于“存在与自由”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声称，“自由高于存在”。因为，自由并不是由存在所引出的，自由植根于‘虚无’，植根于‘无底’、‘非存在’”。存在是静止的、凝固的，是自然主义臆想的事物，是抽象的概念，它指涉自然、本质，指向物和抽象本质的既定秩序，是世界的客体化和理性化，是精神被异化了的世界。自由则不然，它是动态的、开放的，是具体的精神。它指涉创造、真理，是此岸世界的阻断和终结，向上帝之国的飞跃，是自我向精神的回归，是主体之个性的确立。

在别尔嘉耶夫的心目中，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更不是强力

意志的自由，不是意味着随心所欲的自由。独裁者的自由、暴君的自由是自由的幻象，它实际上是人受奴役的一种变形。表面上，暴君和独裁者在“自由”地“统治”，“自由”地“占有”，甚至“自由”地剥夺他人的“自由”。实际上，他们已被客体化、异化的世界控制着，成为某种理念的奴隶，成为某种被抽空了具体生存的玩偶。因此，别尔嘉耶夫提醒人们，要警惕对自由的滥用。“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它完全不是轻松自在的事物，而是意味着一份艰难、一份沉重。把自由看作轻松自在和无拘无束的同义词，是一种颓废的自由观。那样的话，创造的责任就会被消费的本能所替代，自由就在虚假的定位中逐渐退化，最终完全丧失自身。实际上，自由在更多时候意味着自由的斗争，它是对客体化、必然性、决定论的世界的反抗，自由是扩张和创造，是个性力量充盈的显示。自由是上帝赋予人去追求真理的义务，而追求真理的道路布满了荆棘。自由的最高境界是精神生活的自由，自由的最低境界是物质生活的自由。由世界的物质性走向精神性，由碎裂走向整体，由暂时走向永恒，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去贴近上帝，这是别尔嘉耶夫所理解的自由之路。

3. 创造是人的使命

在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中，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自由在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理念，而是社会生活中它的影响之主要形象”。自由的真正问题是创造的问题，人们通过自由，可以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一种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换句话说，自由的最大义务就是创造。创造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根本目标，是人的使命所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零碎的、混乱的、充满了缺憾的现实。人是一个小宇宙，他是世界的中心，存在的中心。作为个性的生存，他超越于世间万物之上，拥有变革现实的内在需要，以求趋达无限和永恒。如此，创造的行为就成了人脱离异化

世界的突破口。

别尔嘉耶夫自述，“关于创造，关于创造的使命之主题是我一生的基本主题。对我而言，这一主题的构成并不是哲学思考的结果，而是内在的体验，内在的领悟”。在他看来，创造把人从恐惧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是源初独到生命，既不面向过去，也不面向未来，它面向的仅是永恒。创造是人由堕落的世界向崇高的、神性的世界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站立在律法伦理学和救赎伦理学之外，创造者以创造证明自身。创造者和创造对拯救和毁灭一类问题毫无兴趣。创造行为具有自足的价值，它不受任何外力的审判。因此，别尔嘉耶夫希望建立一个创造伦理学，以摆脱虚伪的道德束缚和非人性的规范制约。在创造伦理学中，惩罚的恐惧与永恒苦难的恐惧不起任何作用，创造性和神性是同一的。基督教伦理学仅有关于救赎的道德，缺乏道德的创造，这是它在现代衰落的重要原因。在创造者与社会的关系上，别尔嘉耶夫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诚然，创造者是孤独的，创造活动有着强烈的个体特征。但是，创造者决不囿于自我，恰恰相反，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扩张，创造的目标永远指向自我以外。因此，创造的的成果总是具有世界的、全人类的、社会的特征。实际上，创造意指的是人超越自我的道路。它在展现人之个性的同时，最大可能地蕴含了人的共性。

五、人的精神拯救

别尔嘉耶夫认为：“哲学和神学的沉思起点既不在于上帝，也不在于人，因为这两个起点都遗留着不可克服的断裂性”。以往的有神论把上帝想象成天堂的君主，把神性生活想象成天堂的帝国主义。上帝被描绘成一个残暴、傲慢、封闭的独裁者，成了一种绝对的存在，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杖，任意对人施行奴役和凌